

# 新华人

**1-5期合订本**

**《新华日报》在蓉战友联谊组编  
2012年7月·四川·成都**



# 新华人

纪念《新华日报》创刊 60 周年特辑

《新华日报》在蓉战友联谊组编

2010 年 9 月 15 日出版



创刊 50 周年与少言同志合影



2007 年雷勃同志来蓉时合影



2007 年纪希晨同志来蓉时合影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

活一天就要做一天贡献  
一次难忘的采访  
记著：我的终身本职  
人间万事出艰辛

## 本期要目

山城战友重聚会  
促膝交谈情谊深

我与《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回来了

黄金岁月忆山城

活一天就要做一天贡献

一次难忘的采访

记著：我的终身本职

人间万事出艰辛



2000 年温磊、龙村雨来蓉时合影



纪念《新华日报》创刊60周年座谈会  
2009. 5. 15. 成都·杏林宾馆  
创刊 60 周年座谈会合影

## 本期目录

编者的话

### 战友聚会

蓉城战友重聚会，促膝交谈情谊深

### 难忘记忆

我与《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回来了

黄金岁月忆山城

《新华日报》旧址怀旧

怎不忆重庆

她就是使江姐惊喜的共产党员

### 回眸往事

活一天就要做一天贡献

一次难忘的采访

工作之初

往事情依依

### 战友情深

“记者，我的终身本职”

他为文化繁荣献出一份心思

他始终是条大汉

她真是一只火中飞起的凤凰

淡于名利，泰然处世

难忘诤友马逸峰

他善于逆水行舟

### 老有所为

人间万事出艰辛

一生奉献给彝族人民

### 信息交流

北京荆子玉来信

北京温磊来信

上海徐正来信

北京吴士嘉来电

凉山龙行来信

## · 编者的话 ·

《新华日报》于1954年8月31日终刊了，《西南新华日报简史》于1995年10月由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西南新华日报史料》出了7期后随着报史研究工作的结束而结束了。纪念《新华日报》创刊60周年座谈会在2009年5月也召开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新华日报》老职工全都进入耄耋之年。按说，对《新华日报》的这份情缘也该寿终筵散了。可是，人总是有感情的，几十年的战友情谊终生难忘，60年前的相知相交犹如初恋情结难于从脑海中忘却，近年来彼此间建立的交流联系终难割断。怎一个“终”字可以了结？！

纪念《新华日报》创刊60周年时，我们编辑出版了《战友情》——纪念《新华日报》创刊60周年座谈会纪要，寄发给全国各地的“新华人”，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并纷纷表示，希望这一小小刊物能不定期地办下去，让全国的“新华人”有个交流信息、联络感情的平台和载体。而那些因病行动不便、不能参加聚会而又念念不忘《新华日报》的老同志，更希望能了解大家活动的信息和战友们的近况。更重要的是：把《新华日报》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不仅为今天的新闻人，也使我们的子女后代受到教育。不少战友不顾体弱多病寄来稿件，提供信息。根据大家的希望和要求，我们将来稿编成60周年纪念特辑出版，至于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与积极的支持，今后能否有源源不断的稿件支持，《新华人》能否继续编下去，这取决于大家的评价与裁判。衷心地期待着大家及时的信息反馈，更欢迎大家对如何办好这份《新华人》提出积极的建议与设想，并提供各类文字信息和图文资料。

《新华人》志愿者编辑组

顾问：管纪奋

编辑：范家永 陈家济

通讯处：成都十二桥成都中医药大学范家永

邮编：610075

电子邮箱：c/o [Tanyx568@Sina.com](mailto:Tanyx568@Sina.com)

通讯处：成都市桂王桥东街4号川报宿舍陈家济

邮编：610014

电子邮箱：[CJJ1926@163.COM](mailto:CJJ1926@163.COM)

## 蓉城战友重聚会 促膝交谈情谊深

6月4日，时令已近芒种，但成都仍未进入夏天，气温一直偏低，经常阴雨连绵。今日天气晴朗，在蓉《新华日报》战友相约在杏林宾馆聚会。考虑到有些同志身体欠佳，活动不便，我们只在小范围内互相约会，算是平时性的一次小小的聚会，管纪奋、汪航奋和范朗3对夫妇、孙霞珍、侯文川、姚丹、张杰、李荣卿、张成治、陈家济、范家永14人先后来到杏林宾馆。这些年来，在蓉战友一直坚持这样的不定期聚会，每年少则1—2次，多则3—4次。除留在《四川日报》工作的战友外，从《西藏日报》离休到成都定居的张成治和已调出新闻单位、在成都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文献教学科研的范家永等均经常参加聚会。凡是外地战友来蓉，我们就聚在一起欢迎远方的客人，已先后接待过来自北京的纪希晨、温磊、荆子玉、王健，来自重庆的雷勃、沈沉，来自昆明的龙村雨、钟山和来自上海的徐正等。每次聚会，总有说不完的话语，回忆往事，谈些几十年前的趣闻轶事；议论国事，针砭时弊，各抒己见；互通信息，交流各地战友近况；有时也谈到保健养生话题，介绍各自的经验体会。为什么相隔60年的老战友们在一起会犹如初恋时的水乳交融，亲密无间，无话不谈？据西方老年学研究中有一种理论，称之为“社会情感调整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它发现人们的情感易受到他们对时间的敏感性作用。人老了，知道受自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就会把社会情感集中到生活经验中美好的回忆而回避那些不美好的东西。这就是老年人为什么总爱怀旧，留恋青少年以至儿时的往事，思念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或参军时同一部队的战友，这正是各种各样同学会、校友会，部队以师团为单位的战友联谊会、西南服务团以中队为建制的战友聚会胜行一时的原因。在这种老人聚会中，不存在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和情感矛盾，在共同语言环境中找到了情感的归属，有人称之为“话疗”。这也正是治疗老年人容易产生的孤独感、自卑自弃（self-neglect）的有效良方，也是防止老年痴呆的有效措施之一。

（范家永）



2009年5月部分新华人相聚成都纪念西南《新华日报》创刊60周年

陈家济摄

# 我与《新华日报》

· 雷 勃 ·



纪奋同志在电话中告诉我：在蓉的《新华日报》战友计划创办《新华人》内部刊物，作为新华报人间加强联系的平台。我举双手赞成，一定给予积极支持，并动员

在渝的新华报人都积极参与和支持。

我在《新华日报》只工作 10 个月，以后奉调到重庆《大公报》，主持编采工作。一年以后，我又积极参与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的创办工作。其实，我与《新华日报》的关系，不仅是创刊后工作的那 10 个月，而是更早之前的全部创办筹备工作，我从头到尾都参加了。

1949 年春，我从山东济南行军到苏北，跟随刘邓、陈粟大军横渡长江。我军于 4 月 23 日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5 月 27 日解放我国最大的都市——上海。上海解放后，我先后在上海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和《解放日报》工作。当听了陈毅同志关于支援二野解放大西南的动员报告后，我向领导请求到西南去。文管会和报社领导夏衍、范长江、恽逸群同志都同意我去西南，并指示我筹组一个新闻出版工作队，派我去南京联系。到南京后，我找到南京《新华日报》社长石西民同志，他告诉我：南京《新华日报》也准备抽一批干部到西南去。但西南局报纸如何办，领导尚未研究，要由中央决定。

我回上海后，文管会从新闻出版战线抽调近百人（其中《解放日报》约 40 人），领导决定由我带队。另外，上海共抽调和招收去西南

的共约 1 万人，到南京后组成西南服务团。不久，我们去南京集中。这时，在南京已有 3 支新闻队伍：一支由袁勃带队的北平原《解放日报》的同志，他们准备去云南；一支是由陈阵、李力众、萧波带队的南京《新华日报》部分同志，他们准备去川南；一支是从上海来的，准备去重庆。

大约 8 月间，北平新华总社派来的几位电讯工作人员和我们会合去重庆。他们带来两个铜版报头：一个是《新华日报》，一个是《人民日报（西南版）》，交我向领导请示决定。11 月 20 日我们行军到达湘西泸溪县城，与《晋绥日报》常芝青等同志会合。我与常芝青一起去会见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和西南局秘书长刘仰峤，研究到重庆后出版报纸问题。当时确定：报纸名称仍用《新华日报》，作为西南局的机关报。由《晋绥日报》、上海和南京来的新闻工作人员，加上原重庆《新华日报》同志合在一起，组成新的《新华日报》工作班子。就这样揭开了《新华日报》筹办的序幕。这时，从重庆撤出的《新华日报》邵子南、刘瞻、徐君曼、曾岛、羊村、顾页等同志也与我们会合。

1949 年 12 月 1 日，当我们行军到达彭水时，传来重庆已经解放的喜讯。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向重庆进发，12 月 4 日到达重庆南岸海棠溪。常芝青同志派我进城与军管会联系。当晚，我由吴克之带路，步行至范庄找到军管会副主任张霖之，他当场委派我当军代表去接管《中央日报》和《和平日报》。第二天（12 月 5 日）一早，到对岸将队伍接进城，进驻黄家垭口《中央日报》。我们一面着手接管工作，一面积极准备出报。我主动提出，全力抓出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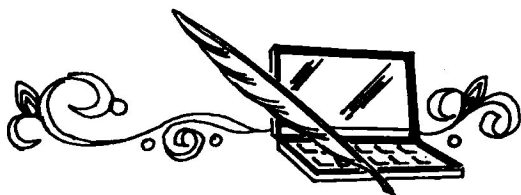
工作，由徐君曼同志接任军代表，领导同意了。

经过短短几天的紧张筹备，12月10日一份崭新的、作为西南局机关报的《新华日报》出版了。山城人民一致欢呼：“《新华日报》又回来了！”

《新华日报》创刊后由廖井丹兼任社长，常芝青任副社长，由常芝青、李蔚然、雷勃、张惊秋（殷白）、陈理源5人任编委，李蔚然任编辑部主任，雷勃、张友任副主任。同时成立了党组，由常芝青、李少言、毛伯浩等负责。报社成立了党总支，我担任第一任党总支书记。不久，高丽生从新华社调来任总编辑，钟林调来任副总编，廖井丹不再兼任社长，由常芝青任社长。1950年10月，我被西南局宣传部调到《大公报》工作，从此离开了《新华日

报》。但是，我对《新华日报》的深厚情感，对与我共同工作战斗过的战友们的深情厚谊是永远割不断、舍不掉的。这些年来一直与老新华报人有密切的联系，我也多次到成都看望战友们。想当初，我们都是一群朝气蓬勃、热血沸腾的青年，而今两鬓如霜，进入耄耋之年。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但自觉无愧人生。

感谢在蓉老新华报人创办《新华人》，高兴之余，挥笔写些往事回忆，也算是对《新华日报》的一份思念！



## 《新华日报》回来了

·殷白·



1947年3月8、9两日，重庆《新华日报》全体同志，同中共中央南方局驻重庆的全部人员一起，分两批被国民党武装押送到飞机场撤离重庆的时候，就向重庆人民庄严宣告：“我们一定要回来的！”

同志们到延安，有的参加了《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的工作，有的接受别的任务，分别各个岗位上为人民解放事业继续战斗。经历了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岁月，经历了打退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到进入反攻的伟大转折。1948年春天，一部分同志随党中央、毛主席东渡黄河，到了晋绥解放区。熊瑾玎、熊复、邵子南、曾岛等同志直接参加了《晋绥日报》工作。这不仅加强了《晋绥日报》，而且鼓舞了我们这

些长期在山沟里办报的同志。战友会师，相处弥亲，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夕，我们一起在新闻战线上留下了珍贵友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一野和二野挥胜利之师，分东西两路向西南进军。终刊后的原《晋绥日报》基本队伍，受命随一野出发，准备解放四川后立即在重庆恢复《新华日报》的出版。

我们紧张地进行准备，分配马匹，驮上办报需用的资料，等候出发。这时中央又来电报指示，估计形势二野将先解放重庆，速令我们从一野转到二野，随刘邓大军从东路进军。我们便改乘火车直达武汉，在武汉留下一部分人员和后勤物资，抽一部分编辑、记者组成精干的小分队，由常芝青同志率领，追赶二野总部。经过长沙、益阳和毛主席的故乡湘潭，最后在常德才追上总部报到。自长沙往西的川湘公路上，我们和西南服务团的万千青年同路进军，我们乘的卡车不断超

越两旁坚毅步行的青年男女，不断引起欢呼，彼此挥手致意。在泸溪，我们同由邵子南同志率领的原《新华日报》工作人员，雷勃同志率领的华东地区新闻工作者汇合，其中就有随西南服务团来的许川等同志。我们从常德起是分散安插随总部的车队行进的，过了湘西泸溪，刘邓首长已经获悉重庆解放在即，他们两辆吉普车摔开车队，加快赶路去了，并命令拨给办报小分队一辆专车，要我们跟上。我们日夜兼程，于11月30日到达彭水，这个小小的山城已成为废墟，城西的乌江便桥也被炸毁，仅靠一只木船昼夜不停地为军运摆渡。那位老驾长喉咙已经嘶哑，仍夜以继日地坚持掌舵，奋力指挥船工，把一辆辆军车送过对岸。因等候汽车过摆渡，我们在彭水被阻3天，已经传来了重庆解放的消息。汽车终于未能追上解放重庆的先头部队。我们为部队进军的速度而鼓舞，也为我们自己的任务而焦急。12月3日黎明，我们才渡过乌江。一过西岸，汽车立即盘旋而上，翻越险峻的白马山，直奔南川。从南川出发途中，汽车断油了，不得不停在路旁，派出同志到附近的东林煤矿借汽油，煤矿立即派人用运煤车沿轻便铁路把汽油送到我们汽车旁。我们的汽车随又加速赶路。过了綦江，油泵出了毛病，喷不出油来，又把我们搁在路上。几个青年同志把车盖打开，一人爬在车头上，后面的人像猴串那样拉住他，用油壶一滴一滴给发动机喂油，哄它前进，一直开拢海棠溪。这时，已是12月5日，江边夜色茫茫，对岸就是重庆。当修理好油泵的汽车在轮渡上破浪过江的时候，我们不禁思潮奔涌，特别是老《新华日报》的同志，陡然想起离开重庆时的誓言：“我们一定要回来的！”现在，仅仅隔了2年8个月零26天，《新华日报》终于回来了。尽管不是原班人马，却扩大了队伍，增加了新的战友。我们将继承《新华日报》的光荣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与重庆人民团结战斗，建设人民的新重庆。

大队汽车在储奇门起岸，浩浩荡荡进城。我们一律穿军装，车上打着一面《新华日报》的红布横额。在夜色中，一时未被群众发觉。但我们每个人的心已经“怦怦”跳动，预感着激动人心的一幕。当汽车穿过林森路十字路口的时侯，在稀少而昏黄的路灯下，终于有人惊喜地叫喊起来：

“《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啊，《新华日报》回来了！”

“回来了！《新华日报》回来了！……”

霎时间，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把车子包围了。我们每个人都把双手伸出车外，拉两边伸来的无数热情的手，欢迎的手。人们拉住我们的手不放，有的拉住我们的背包、水壶，跟着汽车跑，欢迎的人不断涌来，热烈的欢呼和问候响成一片：

“你们回来了！”

“你们好！”

“终于把你们盼回来了！”

我们无法一一回答，只是不断地重复：

“我们回来了！”

“大家好！”

“我们也想着大家哪！”

我们的汽车就这样被簇拥着，缓缓地开上凯旋路，经较场口，直到两路口临时驻地。

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和督促，必须尽快出报。经过3天的紧张筹备，12月9日，在我们接收的《中央日报》简陋的编辑室里，编起了解放后的第一期《新华日报》。我作为值班编委，负责到接收的《扫荡报》印刷所，守着签字付印。这是重庆解放第10天的深夜，我坐着吉普车，不断出示手里拿的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的特别通行证，从解放军战士林立的戒严的行列中通过，我脑海里突然叠印出两年前老《新华日报》同志们被迫撤退的情景和川湘公路上西南服务团的万千青年高歌奋进的脚步。我心里充满了工作的激情。在李子坝的原《扫荡报》印刷厂，设备同样很简陋，只有几台平版机，但工人和留下来的校对人员

都很负责和友好。我在那里呆到天明，在大家的合作下，解放后第一张《新华日报》印出来了。

1949年12月10日清晨，我从李子坝驱车返回的途中，看见人民群众争购新出的《新华日报》的热烈情景，听到新一代的报童自由地叫卖《新华日报》的声音，我心里更充满了欢乐。我想，人民群众如此热爱《新华日报》，过去，多少人为它工作，为它献身，

因为它是宣传真理的报纸，它替人民说话，能说人民的心里话，敢于说真话。这是党报，也是人民报纸的生命。但愿我们不辜负人民的信托，永远不要丢掉这张人民报纸生命攸关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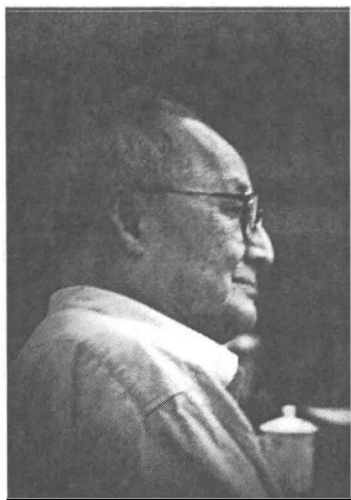
（原载1979年12月10日《重庆日报》）

（注）殷白同志1950年任《新华日报》编委，副刊主编，党组成员，后调重庆文联工作。本文系孙德均提供。

## 黄金岁月忆山城

· 张成治 ·

西南服务团四支队于1950年元月下旬到达山城重庆以后，被分配到西南局宣传部的一共有10位同志。没过几天，宣传部便把我们分到下属新闻单位，吕齐、江苇、翁



士英(即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林田)等5人分到西南人民广播电台，我和范家永、吴士嘉、黄玄之、徐绪正等人分到《新华日报》社工作。

当时报社的领导和业务骨干主要是来自老区《晋绥日报》的老干部，他们大都亲身聆听过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可以说是我国革命新闻工作的先驱。我们开始参加工作，就被分配到这样高层次的业务单位，而且能在许多革命新闻老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应该说是很幸运的。虽然我在《新华日报》只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就奉调进军西藏，但作为我从事革命新闻工作的起点和

基础阶段，这一年多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业务上都使我得到了宝贵的培育和锻炼。尤其是在解放初期那种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大家的革命热情特别高，工作干劲特别大，人际关系也特别单纯，那紧张工作的日日夜夜，那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那崭新真诚的同志关系，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深刻印象。所以我把山城这段火红的岁月，视为我生平第一个黄金时段。

我刚到重庆《新华日报》时，报社是在黄家垭口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旧址，房子、桌子都很破旧。我一到报社就被安排到要闻组，在雷勃同志手下编时事稿。雷勃同志是从华东来的老干部，是两南服务团新闻大队的大队长，他工作认真但不拘板，作风比较随便。记得晚上编稿时，他有时还带一小瓶酒放在案头，不时抿上一口，颇有文人浪漫之风。不久报社搬到解放路原国民党长官公署旧址办公，要闻组和时事组合并为时事政治组，组长是曾孚同志，他是《晋绥日报》来的老干部，工作认真扎实，也很风趣。组里除了我之外，还有汪航奋、曾祥辉两位新手，我们在老同志的具体帮助下，一边干，一边学。每天我们除了编一、四版的时事新闻外，还要管版面、跑排字房，经常要忙到



下半夜或第二天天亮才能下班，工作是相当辛苦的。但那时我们年纪轻、热情高，精力也格外旺盛，对值夜班毫不在乎，毫无怨言，总是把熬夜多吃点苦当作是一种锻炼，是件愉快的事。有时熬了通宵之后只睡两三个小时，就又爬起来工作或参加集体学习。当时不光我们组是这样，其他组的同志也都是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我们上夜班时经常看到，城市组和农村组的一些记者编辑，白天忙了一天，晚上又继续在灯下爬格子。和我们时事组一门相通的总编室，一到晚上更是热火朝天，各组的重要新闻和言论都往这里送，王继槐等同志忙着跑上跑下。遇有重大新闻时，两个夜班办公室里格外红火，社长常芝青、总编辑高丽生、副总编辑钟林等都来亲自督战，从版面到标题都要具体过问，有时为了做好一个标题，大家围在一张办公桌边反复推敲好久。有时我们看到，已经是下半夜了，芝青同志还在那里一边嘴里嚼着纸(据说这是他独特的工作习惯)，一边认真仔细地修改言论。有时稿子全部发排以后，高丽生便跑来和我们摆龙门阵，给我们摆一些他在《晋绥日报》工作时的经验教训和有趣故事。回想当年同志们不仅热情高、干劲大，而且非常重视学习和钻研业务。我们时事组的几个青年人在曾孚同志的带领下，除了晚上集中力量处理当天一、四版的时事稿件外，还就当时国内外经常报道的几个热点问题，分工进行专题研究和系统报道。每天下午我们不是进行业务学习就是配合报道写点资料或小言论，有时晚上也利用等稿件或稿件发排以后的空隙，抓紧翻阅资料或写点东西。曾孚同志首先自己带头写，同时也给我们布置任务，发动全组人人动手写。有段时间，组里差不多每人每周都要写一两篇东西。曾孚同志笔头硬，写起来又快又好，可我那时刚学着写，有时费老大劲写出来的东西质量还不行，于是他便热心地给我具体指点或修改。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越南人民的胜利》

的时事述评，反映当时越南抗法战争的情况，曾孚同志看了以后当即指出稿子写得太空了，并指点说：“写述评应当以述为主，夹叙夹议，最忌空泛的议论。”接着他便亲自动手修改，结果我写的1000多字被删改得只剩下500~600字。就是在这样的具体帮助下，使我的写作能力慢慢有了提高。

当时正是革命大发展的形势，报社对我们这批青年人的使用，也是非常大胆放手的。有这样一件事，至今印象仍很深：那是1950年11月抗美援朝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社会上普遍关心朝鲜战争的形势。一天上午我正在睡觉，编辑部主任李蔚然同志来宿舍找我，让我到报社附近的区委去给他们讲一讲朝鲜战场的形势。我当时真是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仔细考虑就答应了，下午简单准备了个提纲，晚上就应约到区委去了。谁知区委的同志把我带到第一文化馆的大礼堂，我一看楼上楼下坐得满满的，足有1000多人，主席台上早已安好了麦克风，俨然是个作大报告的阵势。我原来以为只是在小范围内随便谈谈就行了，现在一见这么大场面，简直愣住了，可又不好打退堂鼓，只好硬着头皮上阵。按照准备的提纲讲了朝鲜战争的性质、朝鲜战场的形势、我们为什么要支援朝鲜、美帝疯狂扩大朝鲜战争决没有好下场等4个问题。一共讲了1个半小时，虽然没有出什么大的洋相，但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加上心情有些紧张，所以讲得比较杂乱，有些问题并没有完全讲清楚。第二天文化馆又来找我去讲，我有了头天的经验，胆子大了些，又准备充分了些，所以第二天便讲得有条理多了，充实多了。后来区委转告有的群众反映说：“一个年轻娃娃这么会说，真不简单！”我心想，这完全是领导上赶着鸭子上架的，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去作时事报告。现在想起这件事我仍深深感到，当时《新华日报》确实是个培养锻炼人的地方，也是那个特定的时代赐给我们难得的锻炼机会。

## 新华日报旧址怀旧

· 范 朗 ·

2004年春，偕老伴重访《新华日报》旧址有感，打油一首，以志纪念。

五十年后来怀旧，  
旧楼尽除高楼迎。  
久久徘徊礼堂前，  
伟人曾临文物存。  
风雨剥蚀旧貌在，  
难闻欢歌嘞嗦声。  
细数当年劲舞者，  
半早白头半先行。



2004年春，范朗、沈志君夫妇与王继槐夫人王维摄于《新华日报》大礼堂前

当时报社除了从晋绥和华东等地来了一些领导同志和业务骨干外，大部分都是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人。这些青年同志大都积极热情，要求进步，表现很好，但因为受的革命教育和锻炼还不多，所以思想基础比较薄弱，不时也出点问题。针对这样的情况，

报社领导一方面在工作上放手使用，让大家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提高，一方面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关心大家的健康成长。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报社的青年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50年12月上旬，按照上级团委的指示，报社的团组织分别成立了编辑部、工厂和经理部3个支部，改选时我被选为编辑部的团支部书记，其他几位支委是汪航奋、范朗、鲁南和郝品青。记得我们在第一次支委会上，就遵照党支部的意见，确定把加强对团员和青年的思想教育作为团支部的中心工作，同时严格组织生活，规定每星期六为团日。这时团日活动的内容比较丰富，团员的组织观念也比较强，过组织生活时能够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什么思想问题都愿意向团组织汇报，我和几位支委也经常找团员谈心。为了帮助大家提高思想认识，还请一些老同志来给我们上团课。

此外，我们还配合工会积极开展一些社会活动。为了满足工人同志们学习政治文化的迫切要求，这年冬天，我们具体帮助印刷厂办起了机关业余学校，参加学习的有60多人，每周上两次课。我在夜校负责教政治课，主要是教社会发展史，讲人类社会怎样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世界和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等等。我注意多联系工人的实际尽量深入浅出地讲解，所以很受欢迎。看到夜校课堂里热气腾腾，工人们情绪那么高，自己也很自然地受到感染，受到鼓舞。总之，这时报社的政治生活丰富多彩，我们这些青年人都充满着豪情壮志，整个报社到处是一派奋发进取、朝气蓬勃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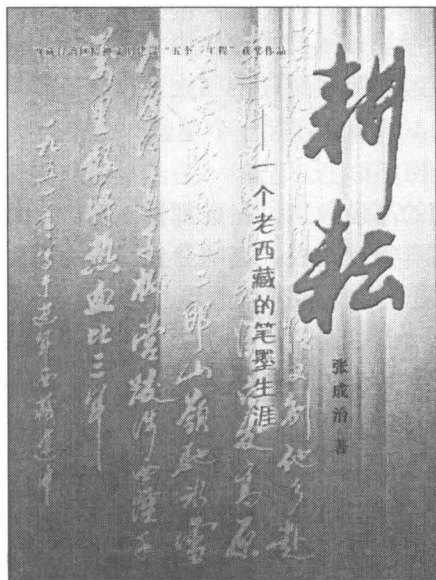
正当我对山城重庆和《新华日报》逐渐产生感情的时候，1951年3月，组织上决定调我到两藏去工作。记得那是3月12日上午，曾孚同志到宿舍来找我谈话，告诉我西藏前线需要新闻业务干部，准备到西藏以后办报，组织上想派我去。他还说西藏很艰苦，问我有什么困难，如果实在有困难，还可以考虑让别人去。猛地碰到这个问题，我首先感到很突然，但心

里只有激动，没有犹豫，稍加思索我便干脆地回答说：“没有什么困难，坚决服从组织分配！”更没有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与我一起调动的还有农村组的彭映华同志，他也和我一样，愉快地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的分配。我们经过两天的紧张准备，第三天傍晚便怀着惜别的心情，在山城的万家灯火中离开报社前往西南军区司令部，向在那里请调干部的 18 军宣传部长夏川同志报到。然后很快从重庆到成都，再到驻在新津的 18 军后方司令部，正式加入了进军西藏的行列，从此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我离开重庆《新华日报》以后，经过半年多艰苦的长途进军才到达拉萨，这时公路尚未通车，交通极其困难，与重庆《新华日报》远隔千山万水，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1954 年《新华日报》随着大区撤销而撤销，报社的同志分散到全国各地，也就更难联系了。在我长期进藏的几十年中，只有管纪奋、李半黎、范朗、李策、李焕民等少数几位同志先后来过西藏，有过接触，

其他方面便只有偶尔打听到一些情况而已。直到 80 年代后期，我离休回到成都安家以后，才又和当年《新华日报》的一些老战友联系上。据了解，在成都的《新华日报》老战友有五六十人，但我接触较多的只有比较熟悉的彭雨、范朗、沈志钧、汪航奋、钱秀秀、管纪奋、曾祥辉、姚丹、孙霞珍、范家永、李荣卿等 10 多位同志。最近 10 多年来，我们每年都要聚会好几次，有时在城里大慈寺茶园相聚，有时到郊区的度假村相聚，一般都是喝喝茶、谈谈心，然后聚一晚餐，大

家在一起共同回忆往事，笑谈当年《新华日报》的一些趣事，仍像年轻时候那样无拘无束，感到特别纯真和亲切。另外，在《四川日报》的新华老战友有时举行一些较大的纪念活动，也邀我参加。1999 年 12 月 8 日，举行纪念重庆《新华日报》创刊 50 周年座谈会时，我应邀出席并在会上发了言。我在发言中除了感谢当年报社对我的培养教育外，还就重庆《新华日报》的历史作用问题谈了些看法，我认为重庆《新华日报》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曾起到过重要的历史作用。这不仅因为她是西南局的机



张成治文集

关报，对解放初期西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发挥过重要促进作用，还由于《新华日报》的班底主要是《晋绥日报》来的干部，这批老同志把党报的优良传统带到了新区。从全国范围来讲，建国初期的新闻事业也属开创时期，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正需要加强革命的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时代特点决定了《新华日报》继承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起了革命大熔炉的作用。《新华日报》虽然只

办了 4 年多，但却人才辈出，桃李满天下，为全国各地培养输送了大批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他们在各地新闻战线上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应当充分肯定《新华日报》在新中国新闻史上的历史地位。在这次座谈会上，我还即席朗诵了一首七绝，表达我对重庆《新华日报》的感情：

黄金岁月忆山城 难忘当年母报情  
远走边关数十载 归来战友胜亲人

# 怎不忆重庆

· 陈家济 ·

我在成都一呆就是 40 多年，而最爱回忆的却是重庆。重庆是我人生旅途一个重要的站口。

1949 年我在重庆迎了解放，那时我才 20 出头；工作有了保障，生活无忧无虑，从此告别了那些颠沛流离风雨如晦的日子。

那时候机关内文娱生活红红火火，出墙报、搞歌咏、办晚会，蹦蹦跳跳，我都是活跃分子。

每到假日，便邀三五好友去文化宫溜冰、摄影、看球赛，最后往泳池里一跳，游它个翻江倒海。饿了就去和平隧道上头，坐郭沫若坐过的那根条凳、那张方桌，吃至圣宫牛肉；去邹容路口尝姑苏小汤圆，听当垆娘子的吴侬软语。晚上看市话剧团的《桃花扇》、厉慧良的《挑滑车》、许倩云的《秋江》、听蔡绍序的《太阳出来喜洋洋》，更多的是跳舞。记得那年国庆节，我们一群青年男女，从朝天门起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跳，一直跳到上清寺。真是一路欢歌一路舞，不知今夕是何年！

最难忘的是那气势磅礴的高山大川。在成都锦江河畔，可以低吟“杨柳岸晓风残月”；在重庆浮图关上，则须是高奏铜琶铁板，高唱“大江东去”。一方山水陶冶一方人的性情。在重庆，即使是打酱油、买盐巴甚至挽恋人散步，都要走过多少坡坡坎坎。这造就了重庆人的坚韧和豪放。

多少个春晨夏夜，我曾在珊瑚坝凤凰台任江风拂面、看帆影点点，如今听说沿江大道已经修通，那地方该变得更加美丽宜人了吧……

以上是我 1996 年 4 月 11 日发表在《华西都市报·街坊》上的一篇短文，距今又有 10 多年了。在西南《新华日报》的 4 年，短暂却很幸福，令人难以忘怀。1954 年我离开重庆走向成都那阵，真有一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落寞。想不到 60 年后的 2009 年 5 月 15 日，管纪奋、范家永两位热心人把我们几十位在蓉的同志邀约在一起，共庆西南《新华日报》创刊 60 周年。这次 2010 年 6 月 4 日，又举行了聚会。当年我们在《新华日报》可能并不认识，没有说过一句话。但一想到曾在一起欢庆解放，在 1000 多个日日夜夜里为办好一张报纸而共同劳动，如今故旧已如晨星寥落，剩下的我们几个能够异地重聚，怎不倍感亲切。人都有怀旧情结。但愿大家家人长寿、常聚首、通音讯、报平安，让我们老而弥珍的故人情谊天长地久，更加温馨！



· 在北泉溜冰 ·



· 在南泉游泳 ·



· 在凤凰台任江风拂面



· 在珊瑚坝看帆影点点

# 她就是使江姐惊喜的共产党员

——回忆引导我健康成长的意姐——

姚 丹（隆宇烈）



人们都知道，牺牲在敌人监狱的女共产党员江姐，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她被捕前的1947年，与另一位女共产党员见面时，却感到意外的惊喜。这另一位女共产党员是谁？是什么原因使江姐那样惊喜？

这位女共产党员就是育才学校的老师廖意林，同学们敬爱的意姐。我是1947年初才进育才学校社会组三班学习，受到社会组主任意姐的教育，虽然只有半年时间，恰恰正是在那很不平凡的半年中，意姐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 目睹大难临头的意姐

我刚在社会组三班上课不到1个月，国民党政府开始全面发动内战，又突然查封了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学校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同学们都知道意姐是由中共南方局介绍到育才的，又是学校地下党的负责人，她本人的安全很重要。可是她却首先安排社会组同学们外出疏散，连我这个才进校的年轻学生也被考虑在内。她要我与另一位同学去几十里路外的青木关中学躲几天。

30多年后，意姐的丈夫苏永扬大哥来四川，我才知道她当时面临着一个比自己安危更巨大的难关。她手下联系着相当一批地下党员，与四川省委的组织关系突然切断后，怎么与重庆当地共产党组织接上关系？听了苏大哥这一讲话，我才恍然大悟，当我从青木关中学回来后，意姐给我的一个任务是为了什么。

大概是3、4月份，已在校外参加了共产党的社会组二班同学徐永培回到学校，意姐要我跟着他出去。他去的都是中学，徐永培已20多岁，当然不像中学生，我去中学倒很自

然。我跟着他先后去过复旦中学、民建中学等处。每到一个学校，都是他一个人到里面去找人，找了谁，谈什么我都不知道。原来我只是在为他寻找地下党做掩护工作。

意姐究竟是什么时候和怎样与重庆地下党接上关系的？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但从当年8月份内学校的两件事情上就可看出，她面临的难关已经渡过了。

## 意姐为何能使江姐惊喜

20来岁就从湖南投奔陕北延安，直到1947年已年近30仍然是单身的意姐，终于与苏永扬大哥结婚了。结婚前她非常高兴地叫我去《大公报》一个朋友处，拿回一幅“伏尔加船夫曲”的油画布置新房。师生们都为她的喜事高兴，社会组一班老同学王传义为此担任“闹房部长”。

另一件事，也是在8月初的一个晚上，她召开了一次社会组的二、三班同学的“告别晚会”。她对较大的同学进入社会工作的地点和单位一一安排。我很快知道这是意姐代表党组织的一次工作分派会议。有的被分派去川东打游击，有的去四川各地做地下工作。当晚参加“告别晚会”的20来位同学，不是陆续参加了地下党就是去了解放区。

以上只是我知道的意姐领导的一部分力量。难怪后来听苏大哥讲，当江竹筠与意姐见面时，知道她手下联系着不少的党员时，即惊喜地说：“那可以组织好几个支部啊！”

要是江姐不在建国前就牺牲在重庆渣滓洞，还会为意姐培养的共产党员的优良素质，更加欣慰。我从上海回到四川后陆续知道，就是我陪着他去寻找地下党的徐永培，参加华蓥山游击队，并任中山区党委书记与国民党的“清剿”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解放前夕即被捕壮烈牺牲。参加那次“告别晚会”的刘光荣，在华蓥山游击战斗中，被敌人抓去处死前，

挺身高喊：“我就是共产党员，你们开枪吧。”1953年我去广安县采访时，特请当地县委的同志带我去他坟前瞻仰。也是参加告别晚会的王继云，晚会一结束，就非常兴奋地向我说，他要去华蓥山这个——用手比一个枪的姿势给我看。我当时也为他能去直接和敌人战斗感到高兴。没想到一年多后在华蓥山游击战斗中，他不愿做俘虏，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时英勇自尽了。还有更多同学一直在国民党疯狂镇压中，历经困难风险，坚持地下工作，直到解放。

### 意姐在学生中产生的深远影响

就在那次告别晚会上，意姐还宣布了另一件事情。因为学校要迁往上海，社会组也要去几个同学。当她指定了宋郁文、石盛宽、冯鸿甲、龙成雨几个老同学外，又念到隆宇烈的名字。我为什么会这么幸运？几十年后宋郁文才告诉我，意姐认为去上海的除老同学外，还要一个成绩好的。育才从来不搞应试教育，我明白，所谓成绩好，只是在意姐对我的培养引导中，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我身上产生了效应。

记得开学后第一次写作文时，本来就有点爱运用横向思维的我，故意不按意姐的出题写，而是把初进育才，又遇到一个讲原则爱批评的意姐，心情紧张无法交卷的心理描写一番。那知意姐看后却给我鼓励：“你的经济有困难，为什么不给报纸投稿，挣点生活费用。”又一次意姐以“国民党是否实行的三民主义”为题，由二班同学分正反两方开辩论会，三班同学坐在一边旁听。听到中途我却忍不住站起来为反方补充一个论据：“最了解三民主义的是宋庆龄，现在宋庆龄都反对国民党，就说明它不是实行的三民主义”。不料我这一打乱辩论会秩序的举动，意姐不但不反感，还回头向我微笑，表示支持。正是意姐按照陶行知教育思想对我的引导，使我始终能健康地成长。1947年8月下旬到达上海，4个月后，我就被吴瑞林（即吴克之）、王传义二位先入党的老同学介绍参加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而且在育才学校才有的民主教育环境中，我也能继续自由地发挥，除担任新闻组主席（即班长）外，还担任学生自治会的社教总干事，组织医疗队、割麦队等为农民服务。我虽然照样上课学习，

被方与严老师把我在内的全校10个同学宣布为研究生后，我还给音乐组的方开开等小同学们教中国历史课。

当然也是意姐分配我去上海，才有机会学习新闻，满足了我从小就想成为新闻工作者的愿望。终于从上海《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一直做到《人民日报》记者。即使离休以后，也像在学校一样，敢于自由发挥，大胆创办了全国发行的《读书人报》，赢得冰心、施蛰存、贺敬之、华君武、艾芜等人题词支持。接着又创办了宣传陶行知教育思想为主的《创业人报》。

### 再一次告别意姐

非常幸运的是，自从1947年7月那次告别晚会后，虽然意姐也离开重庆，还去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1948年底我也奉党组织之命由上海去苏北解放区，先后在华中党校和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没想到1949年秋，当吴克之和我从上海《解放日报》调出，随二野进军西南到达长沙时，我们一起在《新湖南报》社又能与在中共湖南省委工作的意姐和苏大哥见面，使我最后一次看到了意姐的笑容。由于从来做人光明磊落、做事严正不苟的意姐，在文革中不愿忍受无理的批斗而跳河自尽，至今尸体无寻。她虽然不像江姐是死在敌人的监狱，但她却与江姐一样的伟大。我虽然再也见不到她，但她光明地做人、严正地做事的精神，却遗留在我在许多同学的身上。因此我在心里呼呼喊她：“意姐，你并没有死！”

还有一点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当我和吴克之、龙村雨、潘合定4个同学由上海到达重庆后，意姐还来信向我们问候，我一直把她的亲笔书信保存至今。



本文作者姚丹（隆宇烈）摄于2002年

回眸往事

# 活一天就要做一天贡献

· 钟 山 ·



钟山（左）与彭雨合影

我是从爱好文艺走上革命道路的。1948年，我在上海建华银行当练习生。针对当时社会上的腐败黑暗，学习写了篇短篇小说，投寄《银钱报》（上海银钱业联谊会主办）刊出。引起联谊会地下党员梁晓明的注意，介绍我阅读一些国内外的革命文艺作品，从此对革命有了一些认识，并有了参加革命的要求。

上海解放后，我参加西南服务团进军西南。行军途中，我负责主编墙报《新青年》，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到达重庆后，被分配在《新华日报》工作，正式走上新闻岗位。

虽然在行军、集训中学了一些革命道理，开始懂得为人民服务，但开始工作后，深感自己的思想觉悟、学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因此抓紧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在实际斗争中学习锻炼。在剿匪征粮中写了一些报道，受到编辑部的肯定和表扬。

1951年因工作需要，我调到《西南工人日报》任生产组长。1954年大区撤销，我又调到《云南工人报》任编辑部副主任；以后又调到《云南日报》任副刊部、理论部负责人。在各

种不同工作部门，我都自觉地充实和积累自己的知识，把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准确生动地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忘我地努力工作。正当此时，我的健康出了问题，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我多年来患有慢性胃炎，后发展成溃疡，我一直未加重视，仍带病坚持工作。1980年终于产生癌变。当年10月做了胃大部切除时，胃窦部的二级腺癌已经有鸡蛋大了。决定到上海中山医院手术治疗。手术比较顺利，但术后体质极为虚弱，不能进食，又患感冒与腹泻，经医院多方抢救治疗，终于脱离了死亡线。

患了不治之症，又遭此磨难，病入膏肓，奄奄一息。这时“死”字自然闯进脑际。思考再三，我觉得，与其在思想上对死采取逃避而实际上又无法逃避的恐惧态度，倒不如将生死置之度外，耳边又响起参加革命时的誓言：“要经得起各种艰难曲折的考验”。癌症不等于死亡，我要继续为党做贡献，必须奋起与病魔抗争。于是我下定决心，自信而乐观地积极配合治疗；另一方面，以顽强意志加强体育锻炼，咬紧牙关、勉强支撑着起床，扶着病床一圈一圈慢慢走动。5分钟、10分钟……逐渐增加到上下午各1小时，就这样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果然，生命在于运动，半个多月后我就出院了。

但好景不长，不久又开始化疗。在杀伤癌细胞的同时，对人体正常组织的伤害很厉害，白细胞急剧下降，血小板下降，内分泌和消化功能紊乱并出现毒副反应。长时间不能睡眠，不能进食，全身不适，头昏眼花，生命极为痛苦。在整个生病过程中，组织上、同志们对我无比关怀，时常来看望慰问，鼓励我与疾病作

斗争。经过认真考虑，我提出停止化疗，自己加强锻炼，坚持药物（中药）治疗和饮食疗法，配合气功等现代医学和传统治疗手段，与癌魔作斗争。1981年病情好转，我就开始半天工作，到1983年恢复全天上班。1985年中共云南省委在“创先争优”中给我发了奖状，奖语是：“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成绩突出。”1986年兼任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理论辅导》杂志编委和编辑室主任，1981年授予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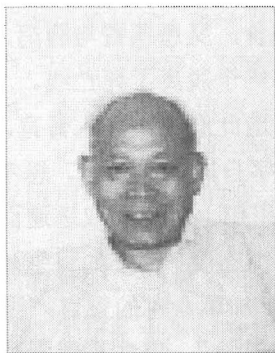
编辑高级职称。

离休后，初衷不变，笔耕不止，为党的新闻事业贡献毕生的精力。只要活一天，就要做一天微薄的贡献。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永恒，而在于奉献。我们生命是有限的，我要使我有有限的生命，尽可能发一点微弱的光和热。

——据《峥嵘岁月》续集摘编

## 一次难忘的采访

· 荆子玉 ·



一次难忘的采访。

那是1952年夏季，报社接到一些读者来信，反映川东地区万县高粱乡金山村农民向长顺的水稻产量不实，是一个假劳模。原来1951年川东行署农林厅评选劳动模范，向长顺的水稻亩产误报为930斤，被评为西南区农业丰产模范，同时被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列为全国1951年农业生产模范。《新华日报》对此事作过详细报道。接到读者来信后，引起报社领导高度重视。因为事关党报应当坚持新闻真实性的根本原则，也关系到党和人民政策的信誉。为了彻底弄清事情的真相，报社派我会同当时正在万县地区采访的兰鸿文同志一起调查研究。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季，烈日炙烤着大地，崎岖不平的、十分狭窄的石板小路晒得发烫，

我们二人肩背行装，徒步奔向向长顺的家。到达目的地后，我们与他同吃、同住，屈膝谈心，耐心细致地向他讲解党的政策，启发他做老实人，主动说出实情。最后，他终于说出实情，当年的水稻每亩产量实际上只有630斤左右。

630斤为什么一下变成930斤呢？带着诸多疑问，我们又到相关部门查阅原始资料。经过反复调查，终于水落石出。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51年8月间，由万县专署农林科、川东农场、川东农业技术指导所以及县、区政府等单位，联合组成水稻选种辅导组，到万县高粱乡实验选种。工作结束时，向长顺被评为生产能手，该工作组直接向川东行署农林厅写了总结报告，报告中说向长顺的水稻亩产为630斤。但在他和另一个人的产量数字上都划了个问号（？），向长顺产量630斤上面的问号和阿拉伯“6”字正好连在一起，模糊不清。农林厅另一名工作人员复写时，将“6”字和“？”误认为是“9”字，就这样层层上报，不进行核实，以致铸成大错。

调查结束回到编辑部后，我们抓紧时间向领导作了汇报，随即写了一篇调查报告。8月16日下午，稿件付排打出小样后，送给芝青同志审阅。他看过小样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详细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逐字逐句对稿件作了修改。我早就听说，芝青同志审改稿件时有喝浓茶和咀嚼稿纸的习惯，这次亲眼所见，使我感动万分。编辑部领导专门就此事撰写了短评：《反对评选劳模中的官僚主义》于8月17日在一版显著地位刊登，在西南地区农村引起强烈反响。

一篇好的调查报告，必须事实准确，观点鲜明，逻辑清楚，文字简洁。经过芝青同志亲自审改的稿件与原稿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我拿着修改后的稿件与原稿一一对照，从中受

到很大的启发与教育，这种言传身教、手把手教育干部的方法令我永世难忘。

这次采访活动，条件十分艰苦，但对我们的意志是一次很好的磨炼。由于当时天气炎热，居住在农民家里，用水十分不便。鸿文同志的脚气病发作，溃烂成疮，行走困难，仍然坚持把调查搞完。

通过这次采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党报的性质与任务，懂得了捍卫新闻真实性原则的重要性，在怎样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方面也得到了锻炼。这是一次难忘的采访。

原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和《晋绥日报》社的老同志们，带领我们新闻干部训练班的10个学员，随原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宣传部的领导同志，于1949年10月上旬从山西临汾出发南下。到武汉后，为了及时抵达重庆恢复《新华日报》，领导同志和老同志们先行去了湖南常德，将我们这个小分队纳入西南服务团。乘长江轮船西进，直到1950年1月上旬才抵达重庆。这时山城已解放1个多月，《新华日报》也已出版1个月了。休息了两天，领导上便将我们安排在编辑部工作。

《新华日报》社先在黄家垭口的原《中央日报》社旧址，是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房屋，编辑部在楼上，营业部在楼下。编辑部最早只有秘书、城市、农村3个组，纪希晨任城市组组长，张友任农村组组长。农村组的工作人员有章彬、阎玉、彭雨、侯文川、范家永和我。随后报社不断增加工作人员，有从陕南来的老《新华日报》同志，有从南京新训班来的同志，有从重庆市和西南军区调来的同志，还有从云南调来的同志，住房和办公室便越来越拥挤，给工作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1950年3

月22日，报社迁至林森路（现名解放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旧址，工作和居住条件有了显著改善。农村组调出侯文川和范家永，调进钟林（林涛）、彭映华、龙村雨、吕荣芝、赵湖。不久，报社给工作人员定了职务，章彬和阎玉是编辑，彭雨是助理编辑，其他是见习编辑。我文化程度低、工作能力差，只靠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整天埋头工作，工间也不休息，虽说工作效率不高，工作成绩不大，只因工作态度较好，仍然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那时的农村组实行编通合一，两位编辑处理准备见报的有关农村报道的稿件，并且撰写短评；助理编辑处理业务刊物《通讯往来》的稿件；其他的人做通联工作，既为编辑选择来稿，又联系通讯干事和通讯员组织稿件。开始只联系川东地区，后来发展到川西、川北、川南和云南、贵州。当时川东地区土匪猖獗，派去农村的记者，可谓“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1950年下半年，服从西南工作发展的需要，报社先后调出一批骨干，并将机构作了一些调整，农村组不再组织担负通讯联络任务，成立地方记者通讯组，由纪希晨任组长，刘希任副组长，并在西南各省区设立记者站。组内有管纪奋、范家永、荆子玉、

工

作

之

初

· 张 杰 ·